

名

家

简

传

书

系

名家

MING JIA JIAN ZHUAN SHU

XI

◎ 余斌 著

张爱玲

中国华侨出版社

43.48
ZAL3

●名家简传书系

张爱玲

余斌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余斌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名家简传书系)

ISBN 7-80120-340-2

I. 张… II. 余… III. 张爱玲—生平事迹 N.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2079 号

●名家简传书系

张爱玲

著 者/余 斌

责任编辑/凌玮清

装帧设计/李呈修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宏飞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125 字数/156 千

版 次/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100029

E-mail:huaq@public.netchina.com.cn

ISBN 7-80120-340-2/K·64 定价:10.60 元

目 录

一、从前	(1)
二、家庭生活场景	(9)
三、“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22)
四、读书岁月	(36)
五、港战中的印象	(49)
六、成名	(60)
七、清水浑水	(74)
八、奇装炫人	(94)
九、三人行	(103)
十、“撒手”	(117)
十一、欲仙欲死	(129)
十二、一语成讖?	(141)
十三、结束铅华	(156)

十四、悄然出走	(172)
十五、哀乐中年	(183)
十六、伤心之旅	(200)
十七、归于平淡	(210)
后记	(224)

一、从 前

1945年4月某一天的傍晚，张爱玲独自一人在黄昏的阳台上，还未从与苏青的交谈中回过神来，她们方才正说到上进心，说到未来的世界。苏青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道：“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此时她骤然看到远处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以为那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正自红红地升起。月亮在往上升，她的心却是在往下沉，她想到，“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富于文学色彩的电影

化的开头，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带些象征意味的画面，我们也许可以选中这一幕来定格：她最爱与之相伴，也最能撩她思绪的月亮；渐起渐浓的暮色于暧昧不明中布下意兴阑珊的氛围；高楼上有人凭栏独自沉吟的人。你尽可以说它是一幅现代的仕女图。

张爱玲尚不满二十五岁，但似乎已是饱经忧患，她肯定不止一次地回首前尘，油然生出难以明言的沧桑感。向来是“登临意，无人会”，谁也无从体验那惘然中蕴蓄的复杂况味。也许她会想起这些年来经历的悲喜沉浮，也许她会想到她的同学，她有过的交往的人。也许她想到了她的家人，她那位身在海外，眼下不知落脚何处的母亲；那位吸鸦片、娶姨太，曾经声言要打死她，现已断了来往的父亲；她的不得志郁郁而终的祖父；她那个漂亮的然而不争气的弟弟。甚至她也许还会想得更远，想到没有见过面，而常在亲戚口中听到的外曾祖父或是“相府老太太”。

我们确凿无疑知道的只有一点，她所沉吟的“乱世”从她外曾祖父那一辈就开始了。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个人在历史中如同微尘一粒，然而一脉相沿，繁衍不息，他又是生命长链中的一环，方生之时就已经有了他的从前——他的家谱让他的生命同遥远的过去相联。每个人的生命中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只是当我们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时，也许会更多地想到历史。

她的祖父张佩纶（生于1848年，卒于1903年，字幼樵、笈斋）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同治辛未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外曾祖父李鸿章则更是大名鼎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不寻常的角色。这二人是古老中国走向没落的见证人，他们各有抱负，均思振作，而都回天无力，不能挽狂澜于即倒。张佩纶马尾一战中看着中国的水师土崩瓦解，或许会感到大清的江山就要沉没，李鸿章则在同那些深目高鼻的谈判对手的交锋

中一次又一次无奈地后退、让步。可以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目睹了一个“乱世”的到来。

张、李二人不仅是正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是野史中的要角。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命运经众口纷传，文人渲染，变得尤其富于传奇色彩，这里面最经典也流传最广的版本当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的有关描述。他的发迹在曾朴的笔下就很有戏剧色彩：庄仑樵（即张佩纶）虽科场得意，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但这位才子却是地道的穷京官，没有多少油水，又兼妻子亡故，自己不善理财，弄到有时一连三天吃白粥的地步。一日正吃着白粥，想到京里京外的官员毫无才学，就凭心黑手长，贪赃枉法，一个个居然都是鲜衣美食，驷马高车，不由心下愤然。曾朴以极世故老到的口吻半揶揄地付度他的心理：“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上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的干瘪死。”

一本奏上去，“上头”嘉许，庄仑樵愈发得意，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自此庄“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总之他是靠一本本的奏折骤然间飞黄腾达了。

野史不免夸张，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直声”而成为朝廷的红人。清流党之所以为清流，不光是因为弹劾贪官污吏，更兼评议朝政，对西方列强持强硬态度。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纶连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吴大澂、宝廷、陈

宝琛、张之洞等人一道，有“四谏”、“十朋”之称。这正是“清流党”的鼎盛时期，几个中坚人物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张佩纶 1884 年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他战前慷慨陈辞，心雄万夫，其实全凭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到任后并无用兵方略。这一年 7 月，法军统领孤拔于大风雨中率战舰掩袭，清军全无防范，又兼兵器陈旧，遂大败亏输，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毁于一旦，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马江之战”。张佩纶身为统帅，不仅指挥无方，贻误战机，而且临阵脱逃，故尔立时遭到朝野上下的齐声谴责，很快被朝廷问罪，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终成话柄。

光绪十四年（1888 年），张佩纶刑满释归，一位大人物将他这个落魄之人收归帐下。这个大人物就是靠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佩纶过去参加过他骄奢罔上之罪，而且李是主和派的领袖，而今居然不计前嫌，肯于提拔昔日的对头，自然被人称道，一时传为美谈。更妙的是李鸿章又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张佩纶（张的妻子流配期间亡故），张由入幕之宾变成了东床之婿。此事轰传士林，人人皆道张又交好运，到了《孽海花》中，则更演为才子佳人式的佳话。

据说中堂大人的这位千金“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且在闺中对张已生仰慕之心，又同情他的时运不济。戏剧性的“惊艳”一幕发生在威毅伯（即李鸿章）卧房里，庄仑樵有事前来参拜，见床前立着一个美貌小姑娘，一时不及回避，却被威毅伯望见，唤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小姑娘红了脸，道个万福，飞身逃进里间。更巧的是庄仑樵瞥见桌上有一卷署着“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就见两首议论中法战争的七律，起首两句便写道：“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

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是“千秋功罪付史评”，对他竟是有责备更有曲谅。庄仑樵当下“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的落了下来”。威毅伯笑嘻嘻告诉他这是“小女涂鸦之作”，听庄仑樵立起身来“正色”赞美，又笑托他替女儿物色配偶，且规定“要和贤弟一样”，还“忽然很注意的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下明白，出来就托人去求婚，威毅伯“一口应承了”。

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也一样的容易弄巧成拙，因为上面那个戏剧性的场面中威毅伯父女俩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听上去简直像是威毅伯精心安排了这次会面来赚庄入局。但是佳话总是为人乐道的，人们对这段姻缘，对其其中的人际关系，似乎比对张、李二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感兴趣，多少年以后的人谈起张爱玲时，也免不了要把她祖上的这桩传奇婚姻拉来凑趣，仿佛如此一来，“张爱玲传奇”便更添传奇色彩。事实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张爱玲本人的态度，有一次她对人说起，她祖母其实不大会做诗，外间传的两首诗（即《孽海花》中的两首七律）也是张佩纶改过的——感慨良多，原来是“甘苦自知”。既是改做，说不定诗还写在两人婚后，果真如此，曾朴笔下的佳话便彻底“解构”了。推论出此事的真相无关本书宏旨，关键是张爱玲的“透底”让我们识得张爱玲其人：她不要传奇，不要佳话。

李鸿章显然器重张佩纶的才干，这才将他引为心腹，他驻节天津时，张也一直随在他幕中。但是二人虽成了翁婿关系，张佩纶“清流党”慷慨言事的书生意气似乎并未全部收敛，1900年他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国代表谈判，因在对俄国的态度上与李鸿章意见不合，拂袖而去，回到南京，从此称病不出，绝足官场。同辈中张之洞做了两湖总督，吴大澂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大臣，他们偶或经过南京，故人相逢，把酒言欢，张佩纶曾慷

慨悲歌，泣下数行。

他是“学而优则仕”，由科考的“正途”做的官，也像古来挂冠归隐的文人一样，过起学者生涯。他在流放期间著有《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此际又写有《涧于集》、《涧于日记》等。（所以胡兰成化名张嘉仪在温州潜逃时冒称张佩纶后人，温州宿儒刘景晨听了要说，那是有家学渊源的了。）张爱玲小时听长辈影影绰绰谈些祖辈的事，有时也想把未听明白处向大人问个明白，大人敷衍她，说全在爷爷的书里写着，她便抱了一大堆来，半懂不懂地看。她看的也许就是《涧于日记》之类。

张家在南京的宅第是张佩纶为了与李家千金的婚事购下的，此处原为清靖逆侯张勇的府院，有三幢三十六间房屋，张以重金买下后又大加修饰，府院中有一处冠名为“绣花楼”，专供其妻李氏居住使用。民国以后此宅院几经易手，1928年10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立法院长胡汉民慕名选它做了立法院的办公用房。谁知等着他的是一场虚惊。据说胡汉民高高兴兴搬进来之后，这楼房一反常态，没有一天安宁过，每到夜晚楼房上下门扉在无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竟倏忽无声自动打开，令人毛骨悚然。更奇的是胡的一位胆大心细、膂力过人的贴身警卫不明不白在楼内开枪自杀。此事传开后，军政要员及立法院的全体职员都为之惊愕，胡汉民居然为此搬到了别处去定居。

张家的后人若听到此事不知会做何感想，想他们的先人壮志未酬，郁郁而终，死难瞑目，阴魂不散？不管怎么说，张佩纶1903年确是在这里谢世，而张爱玲的父亲也是在这里娶了南京黄军门的小姐（军门相当于如今的省军区司令员）。大概因为父母生长在南京，又有祖籍安徽的口音，张爱玲后来说她的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她们家后来搬到南又搬到北，有些佣人也是从南京带出去的，《私语》中写到的令

她感到亲切的“毛物”一家便是，她也因他们而“对南京的小户人家一直有一种与事实不符的明丽丰足的感觉”。张家黄家在南京肯定有不少亲朋故旧，张爱玲也去过南京，所以才有机会去纠正她幼时的想象，而在《十八春》中，她写到沈世钧在南京的家，写到顾曼桢的南京之行，对南京的风习、景物、建筑虽着墨不多，却能写得相当准确传神。

张家的人对张佩纶似乎大多都无好感，张的姑姑、母亲都不喜欢他，说他的相貌与漂亮的祖母不般配。这似乎是老太君态度的遗留。当年李鸿章的夫人初不允这门亲事，除了嫌张佩纶偌大年纪，又是“囚犯”之外，也嫌他其貌不扬。李鸿章在外威风八面，在家却是惧内，夫人哭闹着不依要拼老命，他也束手无策，后来还是小姐本人“慧眼识英豪”，决意要嫁，这才成了好事。张爱玲似乎是继承了祖母的立场，她根本没有见过祖父的面，却说祖父好；她不见得同祖母一样，倾慕祖父的才，那么她是从亲戚的言谈议论中，从祖父的手泽中感到了他是一个“真人”，还是祖父大起大落、坎坷淹蹇的际遇更能让她听到“人生的回声”，更给她一种寥廓浩茫的“身世之感”？

有李鸿章、张佩纶这样的先人，出身于这样显赫的门第，张家的后人是不好做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祖上的余荫令后人得享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先人打下江山，挣下家业，后人再要想光宗耀祖，逾越先人，也就难了。于是煊赫的过去成为无形重压，令后人感到难有作为（且境况也允许他无所作为），掙不动这重压者即得软骨病，成遗少，成无用之人，张爱玲的父亲、弟弟，都是如此。张家上上下下似乎都是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在先人的阴影里。张爱玲小时候常听到父亲与客人、亲戚高谈“我们老太爷”，亲戚间，甚至男女仆人也常是口不离“老太太”、“相府老太太”之类。大约议论昔日繁华是他们最风光得意

的时候。

张爱玲出名后，也有人说到她念念不忘自己的贵族出身：“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此说不知是否属实，即使果真如此，我们也还可以找到一些反证，证明她不想沾祖上的光。《古今》编辑周黎庵某次见到她，曾向她问起与张家的关系，她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他。倒不是她想隐瞒她的出身，或是不愿提及她们家的“从前”。她自小就有几分矜持，是多长了个心眼的人。她想弄明《孽海花》中的故实，抱了爷爷的集子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但是她不好意思问先生，因为问起这些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这种心态也保持到她成年以后。《流言》中有好几篇自传性的散文，对其家世从未正面交待一句，说明她不愿借祖上的光来让读者增加对她的兴趣；当时关于《孽海花》人物世家的“考据”很是热闹过一阵，她则从不置喙，有意识地与遗老遗少及名士派的文人保持距离。她的这种态度有时甚至给人清高自恃的印象，从她的文章看，似乎只是在她晚年以后，她才能够做到不撇清高亦不自得自恃，心平气和地面对她们家不寻常的“从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爱玲尽可不必去多那份心了：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张佩纶的宦海浮沉、风流佳话则随了老一辈的逝去渐渐成为一段模糊不清的记忆。遥想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张佩纶、甚至李鸿章也许都已成为只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出没的历史剪影，而张爱玲则会像她喜欢的李清照一样，与后世的中国读者相觑相亲。到那时，张家的后人打开他们的家谱，值得他们炫耀的也许不是那位炫赫一时，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祖先，而是写出了《传奇》、《流言》、《秧歌》的张爱玲。

二、家庭生活场景

张爱玲 1921 年 9 月在坐落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里出生，以后她在大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租界的地面上度过的。租界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又是外国人管辖的地盘，与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喜欢寻绎巧合与象征性事件的人或许愿意从中生出丰富的联想：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也有一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复杂情结；对应于租界三不管的边缘位置，她也是个永远立于一切潮流之外的边际人。

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古老的文化与那种安稳、舒缓、妥帖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个乱世到这时似乎是愈发乱了。南边在北伐，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就要被逐出有天下一统的气象的紫禁城，象征着王纲礼乐的彻底崩溃；这边，也就是在法

国租界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举行……天下大乱，大乱。但是这一切都在张公馆的门外，张公馆仍是“重门深掩，帘幕低垂”。

封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的过去了。事实上，在张佩纶还活着的时候，张家已走上了下坡路，到了张爱玲父亲这一辈，更只是仰赖着先人的余荫。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些旧的世家望族表面上仍旧可以维持往昔的生活格局，旧制度的崩坏一时还没有打破家庭日常生活的平静。张爱玲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度过的。优裕的物质生活，阔绰的排场，假如说这下面潜藏着未激化的矛盾和危机的话，它们也非童稚的心灵所能觉察。张爱玲还记得她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眼泪珠滚下来”，但是她当然不会同情他的“亡国恨”，或是有什么异样的感触，她能领略的是生活中令她感到惬意的那一面，对于她，幼年的生活是温暖朦胧的、橙红色的岁月。

这样的印象多半是她[○]在[○]天[○]津[○]的[○]那[○]个[○]家[○]给[○]她[○]留[○]下[○]的。在她两岁时她的家搬到了天津。这时的张爱玲生活于成群的仆佣中间，常由佣人抱着走亲做客，开始熟悉节日庆吊、亲友往还这些旧式生活中的日常内容。稍稍长大一点，家里专门为她[○]和[○]弟[○]弟[○]请[○]来[○]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念到晚，这是她受教育的开始。塾师教学的秘诀是背书，张爱玲因此记得那时天天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并且有一段时间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为此甚至到了除夕夜还用功背书，以致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没有照她的嘱咐早早喊她起来迎新年，第二天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不过这样的“不快”遮不住童年的快乐。在院子里看她唤作“疤丫丫”的丫头秋千架上荡秋千，听“毛物”讲《三国演义》，听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说故事，夏天穿了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在天井里唱谜语，这些都令她开心。我们还得感谢她在《私语》中记下了许多细微的印象，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橙红色的岁月”的质地：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每天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睡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

★ 张爱玲的印象、感受为华丽的色彩、温暖的色调涂染覆盖，从中她体味到这种生活方式特有的舒适、悠闲与慵懒。这是一个感官乐于沉溺的物质世界，而与外界隔绝造成的静谧、迟缓的生活节奏也有助于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的养成——它允许并鼓励你将时间花在对身边物象、细节的鉴赏之上，迟滞、逗留、反复地玩味，从中获得愉悦的享受。一般地说，旧式生活就在这样的享受中证明自己的品位、身价，而人们也在这样的享受中达到与环境的和谐。所以并非偶然的，张爱玲在回忆中总是对一些看来微

不足道的物象和细节保持着鲜明生动的印象：“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痲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这些对于微妙感受的追述都是纤细的，有工笔画的风致。夏志清曾赞赏《传奇》中关于闺阁所下的写实功夫，张之能够提供有关房屋、室内陈设、服饰等等的大量的细节描绘，与她的生活环境以及在这环境中养成的精致纤巧的趣味有直接关系。

八岁以前，张爱玲领略到的真正有点严重性的不快似乎来自她的弟弟，虽然她弟弟是无辜的。旧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贵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多少，而且长得漂亮，幼时自然是得宠的人物。不过纵使弟弟夺了她的宠，由她父母那里表现出来的偏爱想必也并非她一眼就能看出来，男尊女卑意识最重，最让她受气也最让她不能忍受的倒是底下的佣人：领她弟弟的女佣唤作“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女佣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张爱玲不服，常与张干争起来，张干常常就要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因为这个家将来是她弟弟的。张爱玲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后来半真半假地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张干也使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小说中一些处处揣摸主人心事，狐假虎威看其眼色行事，又满脑子可笑旧意识的佣人形象，比如《多少恨》中夏家的女仆。

从佣人那儿受的气使张爱玲发誓要“锐意要强”，务必要胜过弟弟。但是除了不能变成男孩子以外，要胜过弟弟也太容易了。她弟弟身体没她好，没她聪明，没她会说话，读书也没她强，张爱玲说她“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家中并无别的小